

汉语历史语言学的 传承与发展

——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朱庆之 汪维辉 董志翹 何毓玲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汉语历史语学的传承与发展

——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朱庆之 汪维辉 董志翘 何毓玲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朱庆之等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309-11995-4

I. 汉… II. 朱… III. 汉语史-语言学史-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58 号

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张永言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朱庆之 汪维辉 董志翘 何毓玲 编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48.5 字数 731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995-4/H·2575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汉语词汇史的开拓者(代前言)

——我所敬重的张永言先生·····	李如龙	1
-------------------	-----	---

小议词义的扩大和缩小·····	蒋绍愚	9
简论反义并列式复音词的分类及其词义的抽象化·····	王云路	28
说“古人自有复语”·····	伍宗文	45
说“逸义”·····	颜洽茂	60
试论汉语截割词·····	刘 翠	77
试论北朝史书所见若干带有地域性的词·····	真大成	86
从中古注疏看汉语词义的发展·····	方一新	114
古汉语词义的探索历程·····	谭代龙	125
试论古代农业俗词语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地位·····	化振红	141
《庄子·秋水》臆札·····	胡敕瑞	153

“拉”字考

——兼论考本字的方法·····	潘悟云	166
-----------------	-----	-----

说“饮”·····	黄树先	173
说“脖子”·····	汪维辉	183
禁止副词“别”字来源再考·····	蒋冀骋	216
“浩劫”的来源和意义·····	俞理明	222
倒霉·倒灶·刷子考源		

——兼释甲骨文“每”字·····	杨 琳	233
------------------	-----	-----

说“徇”“讟”·····	裘锡圭 陈 剑	248
--------------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贰)》中的介词“于”和“於”

——兼谈清华简的真伪问题·····	董志翘	280
-------------------	-----	-----

试论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	张涌泉	294
汉语词汇书写形式的革新		
——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	江蓝生	323
《说文》“表”为“衣上”说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研究之一·····	黄金贵	338
历时与共时		
——汉语语法史中语言接触研究的两个不同视角·····	曹广顺	343
近代汉语“无奈”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	李宗江	361
趋向词的主观化：情态义的获得·····	董秀芳	381
从词汇语义信息看“差点儿没 VP”的演化·····	帅志嵩	391
略论《国语》的范围副词·····	李 玉	417
德昂语的极性问句式“F-V-not-V”·····	吴福祥	431
试论佛经翻译对汉语呼词“喂”之产生的可能影响·····	朱庆之	444
敦煌文献与梵汉佛经词语互证三例·····	陈 明	507
汉译佛典“S,N 是”句的“是”表示判断		
——以梵、汉本《撰集百缘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		
《妙法莲华经》的对勘为例·····	陈秀兰	519
中古译经中的“未曾有”及其流传·····	朱冠明	535
试论佛典俗语词的推源问题·····	陈文杰	552
《葛藤语笺》商兑·····	雷汉卿	563
从无穷会本《大般若经音义》“先德非之”考察古代日僧的		
汉字观·····	梁晓虹	586
“注子”考		
——兼论佛经讲疏对中土义疏的影响·····	王启涛	611
韵律、句法、语体、语义的综合分析		
——以“而立之年、纸老虎、耳挖勺、蝶泳、妈呀”五个词		
为例·····	冯胜利	621
《切韵》严凡、真臻合并说商榷·····	冯 蒸	638
《现代汉语词典》与训诂学·····	祝鸿熹	649
试论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学术价值·····	祝鸿杰 李嘉翼	653

巴蜀方言学史概要

——历代巴蜀学人的方言学研究评述·····	李文泽	664
二程语录与近代汉语研究·····	黄锦君	688
自然语言与文化语言略述·····	邓季方	697

一个语言学人的“观战”与“臆说”

——关于中国古人类学家对基于分子生物学的“出自非洲说” 的诘难·····	鲁国尧	712
略谈印欧人的“故乡”及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 ·····	徐文堪	728
Superfluous Remainder and Reminder: Three Rocks in <i>Dream</i> <i>Reminiscences of Tao'an</i> ····· Dingru Huang and Victor H. Mair		740
再谈我国马镫的产生时代·····	骆晓平	757
师恩难忘,如沐春风 ·····	何毓玲	765
后记·····	朱庆之	767

汉语词汇史的开拓者(代前言)

——我所敬重的张永言先生

李如龙

1981年,我到成都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第一次年会,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张永言先生,他和我们称为“老大”的黄家教先生是深交挚友,一见面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大哥那样,促膝深谈,多方关心,爱护有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刚刚拨乱反正,语言学的教学研究百废俱兴,记得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音韵学会的成立大会时,听到许多老一辈语言学家的高论,顿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以前调查方言和学习音韵学时积下的许多问题,都想重新做些思考。那次去成都前,特地先在桂林、昆明停留数日,做点壮语、傣语的调查,希望能从民族语言的比较找到研究方言和音韵的出路。和张先生的交谈中,我得到不少鼓励,后来又读了他的《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音韵学会论文)的初稿和《语源札记》,我才壮起胆来,拿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试着写了几篇文章。1982年在北京的国际汉藏语学会上宣读的《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s的研究》,就是在“送气流音声母说”的启发之下写的。在调查闽南方言时发现过不少读为h声母的次浊声母字,如疑母:额、鱼、岸、迎、危、砚;泥母:年、诺;日母:燃、肉、簪;明母:棉、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豁然开朗了。通过和壮侗语的比较,提出了来母读s也是上古音送气流音的余存。1983年又给汉藏语学会的夏威夷会议提交了《闽南方言和台语的关系词初探》,其中关于闽语的“骹”(脚)是壮侗语的ha的“底层”,也是在张先生的启发下得出的结论(均见《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当年所作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比较,只是如履薄冰的探索,就是有关先生的鼓励才壮起胆来的。

收在《语文学论集》中的好几篇用民族语言的材料论证古籍中的疑难词汇的文章,是张先生开的训诂学和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的先河。除了上文提到的两篇以外,还有《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语源探索三例》《“轻吕”和“乌育”》和《汉语外来词杂谈》等六篇,都是80年代发表的。这在当时训诂学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很少沟通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给人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尤其是“五色之名”一文,抓住人类认知颜色的基本词,从上古汉语的同义词分析入手,按照章太炎的“经以同训,纬以声音”的方法,把同义词“归纳为一个个词族,以此作为进行其他各种研究的张本”,“试图以古汉语与台语做一初步比较,看看其间有无‘关系词’可寻”(第177—178页,均为《语文学论集》一书的页码,下同)。不但提出此项比较研究的方法,全文还罗列了“黑、白、赤、黄、青”五种颜色的上古汉语同义词三百十一条和壮侗、藏缅等语言的颜色词三十八个,以供后人做分析。

这组论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述得很精彩的“𪗇”和“𪗇”。他从《越绝书》的“越人谓人‘𪗇’”确认了闻宥先生所说的即指现今台语的“男人”,并用壮侗诸语言的材料以及李贺诗句“官军自杀容州槎”来加以论证。后来我在《福建方言》一书中用福建西沿八种客赣方言和受其影响的闽语龙岩话的“称人为sa2”及其他壮侗语的类似说法再做过论证(李如龙1997,第112页)。张先生又说“𪗇”是闽南话的“船”,读为tsong,是“出口转内销”,先由马来语借用到南洋(新马、印尼)去的闽南话(漳州腔,那一带早期去的漳州人居多),后又用汉字造出新的形声字来标记它。这些考证虽然未必每一条都是不刊的定论,但大多十分精彩,却是可以肯定的。古今汉语、南北方言、汉藏语言的交叉研究、相互论证,今天看来是寻常事了,在当时,汉语史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各据一方、少有往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开拓精神。从事这项研究非有广博的学识和胆力不可,想要跟进并不容易,所以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和者盖寡”,至今还值得后辈学者学习。

要开拓就先要有根据地,要创新也得先有好的继承。永言先生早年做的是训诂学研究。在继承前代训诂学的成果时,他既不是全盘接受和肯定,也没有轻易指责和否定,而是采取科学客观的分析态度,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例如对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就肯定了它从《助字辨略》的“筭路蓝缕”走到了“开疆拓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75页)。但是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些常用的语辞还没有收入,没有用散文用例与诗词互证,尤其没有联系当代的方言作解释。这就是传统训诂学的痼疾:只是局限于部分书面典籍的考释,而没有拿常用词语和实际口语(包括方言)作比较。就以张先生文中所举的字为例,便可以找到许多恰当而有力的方言例证:“真成”作为副词表示“真的、确实”,在闽南话中就还很常用,读为 tsin1 tsiã2,如说:“真成悬”(实在高)、“真成古意”(非常厚道);“争”表示“差”,在粤语还常常单说(争几多:差多少),在闽南话中则与“差”合成双音词说成“争差”。文中指出的张著释义不够精确和概括也很中肯。例如“斗(鬥)”解释为“拼、并、合”就失之含混。“斗榫”见于江淮官话和吴语、闽语,粤语说“斗木佬”(木匠),义为“组装”;闽语说“斗阵、斗伙、斗伴”,义为“组合”。

另外一部张先生评介的训诂学名著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在肯定其“据目验考释名物”方面“相当出色”的同时,也指出了“不够审慎”、“失误甚多”(第27页),诸如“音同、音近、合声、声转、声通”等“以音释义往往失之于滥”(第33页),在词义解释上则对词的完整性和多义性认识不足,在虚实分辨、古注辨正方面也常有附会和差误,最后的结论是“瑕瑜互见,得失相参”(第45页)。这种典籍评介,能根据语言事实作出评论,继承中有扬弃,才是对待传统研究成果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后学才会有切实的帮助。这是永言先生长期从事语言学教学中积累下来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可贵经验,时至今日还很值得高校老师们学习。

永言先生是在艰难困顿的抗战时期上的中学,因为得到许多内迁四川的名师如叶圣陶、吕叔湘、冯友兰、贺麟等的指点,不但通读了大量文史、小学的经典和时贤的现代语言学论著,而且在这批大师的影响下,很早就掌握了英语和俄语,接触到西方语言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有这些积累,在日后的教学研究中才能“拓宽学术视野、扩大知识源泉,让固有传统学科与国际汉学、东方学沟通,给汉语史研究吹入一些新的气息”(第435页)。这种“中学打底、积累材料,西学启发、形成理论”的学术途径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一代宗师们开辟出来的。张永言先生正是能够承前启后,才成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语言学大师。

除了上述的开启训诂学与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的先河和分析评介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成果之外,永言先生在汉语史的研究上还有许多理论上的创获。

创获之一是关于词义演变研究的方法论。1960年,永言先生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词义演变二例》,讨论了“闻”从“用耳朵听”发展为“用鼻子嗅”,指出了这个变化不是太田辰夫所说的发生在六朝,他援引了《史记》《博物志》等典籍中的许多例句,后来受到殷孟伦先生的启发,又把“嗅”义的用法上推到西周。并确认了“听、嗅”二义“最初是兼包的”,“是共时的交替而非历时的演变”,是“感觉的挪移”或“通感”(第8页)。后来受到傅东华先生的质疑后,他又写了《三谈“闻”的词义》(1984年发表),肯定了“指出某一个词到某一个时代才有某一个意义”“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反驳了傅先生“只须利用汉语本身的丰富遗产,便可以自给自足,不一定要乞灵于亲属语言”(第13页)的意见,指出“亲属语言材料的充分合理的利用必将为汉语词源研究开阔新的视野”,“除了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外,还必须吸收外国语言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16页)。对于傅先生说的“音、形、义三者互证”的“特有方法”,他也没有简单地认同,而是强调了“广泛系联音同义近的字”的“声系法”才是汉字的特点所规定的汉语特有的词源学方法,也是训诂学家们经常运用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的方法”(第15页)。应该说,《语文学论集》开头的这三篇文章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汉语词义、词源的研究,至今还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汉字的特点所规定的汉语特有的词源学方法”这个画龙点睛的说法,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创获之二是关于词的“内部形式”的论述。这是1981年发表在《语言研究》创刊号上的论文。自从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理论传播之后,许多学者都相信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不可论证的。永言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参考了洪堡特和兹维根采夫的提法,结合汉语的实际和传统语文学的多种结论,详细地论述了大多数语词都可以找到它的“得名之由”,也就是词的理据。正如洪堡特说的,词“是语言创造力量在发明词语的某个特定时刻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是由精神在语言创造过程中独立自主构成的”(洪堡特1997,第104页)。张先生认为:“除了一些原始名称以外,语言里的词往往有可能考出其内部形式或者理据。”他还说,汉语最常见的构词方法是词根复合法和加缀派生法,其内部形式是显而易见的;语义分化构成新词(桌—桌、椅—椅)和语音变换构成新词(结—髻、执—贄),新旧词构成了词族,也有理可寻;而单音和双音的单纯词的内部形式,则“可以用汇集同根词进行综合考察的方法来加以阐明”,

“‘单纯词说不上有什么内部形式’，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第167页）。按照传统小学“音义相关、音近义通”的原理，文中还列举了不少实际例子，如《史记》“蜚廉善走”的“蜚廉”，应是从“风曰蜚”来的；《庄子》的“望洋向若”，如果和同时代的“望羊、茫洋、网养、滢蕩、滢浪、网两、魍魉”等联绵词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都有“迷迷糊糊或模糊不清的样子”（第173页）。此外，民间常见的“流俗词源”，例如把一些地名附会成不同的含义，甚至用它编造出离奇的故事，这就说明人们都是喜欢给词语安上个好理解、好记忆，并且生动有趣的得名之由的。四川丰都县的“阴王庙”原是奉祀“阴长生和王方平”两个仙人的，后来却成了“阴曹地府之王”，丰都也因而成为“鬼都”了（第175页）。看来，由于汉字的形音义一体、以表意为主，又用字组词，字义和词义相关，因而造成“望文生义”的习惯，汉语词汇的理据比起其他语言可能更加充分，这一点也是很值得进一步发掘的。

关于“名称是怎样成立的”“山川是怎样得名的”“名称是怎样改变的”，张先生早就关注过了。1964年他在《中国语文》发表的《酈道元语言论拾零》一文，列述了酈道元结合地名的研究，提出了山川“以物色受名”，又有“因声以纳称”，也有“因色、因形”以纳称的。在地名的演变中，还提出过“字随读改”“读随字改”“音从字变”，从而赞扬了酈道元考察地名时的语言学之功（第163页）。

创获之三是关于汉语词汇特点的概括。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汉语词汇”条是张永言先生撰写的，其中所述六条汉语词汇特点，就是很精彩的概括。“单音节语素和复合构词法”与“双音节化趋势”，这是他所列的第一、第二两条，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整体架构。汉语词汇正是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的，双音词及其他多音词则是由单音词（或语素）复合而成的。复合构词作为汉语构词的主要特征和西方语言的以语根加上语缀构词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而多音词语大量发展之后，许多又压缩为双音的结构（杞人忧天——杞忧、对外贸易——外贸、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申请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奥）。第三条，“构词法和句法的一致”，这是吕叔湘、朱德熙先生都曾经说过的，文中说：“汉语里应用最广的构词法是词根复合法，即依照句法关系由词根组成复合词的方法。这种构词法跟由词结合为词组的造句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第419页）第四、第五两

条,“叠音字和联绵字”和“四字成语”,则把复合词以外的最具汉语特征的词语也说遍了。最后的第六条,“外来词的义译”则反映了汉语的“自源性”和汉字的“表意特征”,因为这两个原因,汉语总是不喜欢用音译法借用外族语词。这六条简短的概括,把汉语词汇的主要特征都说清楚了。张先生把这篇《汉语词汇》收入《语文学论集》时,在《前言》里谦虚地说,这一篇“不是论文或札记,列于篇末”,其实这是对汉语词汇特征的精粹而简明的提炼,没有很深的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时,张永言先生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四川大学的教学,由于他的勤奋,很快就崭露头角。刚过而立之年,就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论文,评论张相、郝懿行的训诂学名著,讨论词义的演变和研究的方法。当遭到一些老一辈学者的批评之后,他颇具辩驳的胆力,表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深厚积累的底气和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在长期教学生涯中,他从不张扬自己,而是认真负责,拿潜心研究过的精品教给学生。1981年,为了对学生负责,他根据多年教学的经验,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读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札记》,指出了这本通行很广的教材中的一些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教书和研究是何等的仔细;也可以看到他对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广泛涉猎和丰厚的学术素养。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承前启后的学者,他不但能够深入发掘语文学传统,熟练掌握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而且能够站到时代的前沿,了解国内外现代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在新旧传承、转型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1947年,王力先生在《新训诂学》一文中对训诂学作了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的要求。他说:“等到训诂脱离了经学而归入了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到了那个时节,训诂学已经不复带有古是今非的教训味道,而是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了。”(王力,1958,第289页)《语文学论集》也有十篇是对旧训诂学作“清算”的,更多的则是按照“新训诂学”的要求所做的研究成果,包括词义演变的考察,古汉语词汇与民族语言的比较,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解释,这几类研究便是运用新的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词汇史的,而且这些课题都带有前瞻性,能够给予后来者重要的启发。

这些启发之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所提倡的常用词的历时研究。1995年,他和得意门生汪维辉联名,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文中说:“常用词的历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而

且是大有可为的,但迄今尚未引起词汇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大家的兴趣和工夫几乎都集中到考释疑难词语上头去了。这种情况看来亟须改变,要不然再过一二十年,词汇史的研究将仍然会远远落在语音史和语法史的后面。因为常用词大都属于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它的变化对语言史研究的价值无异于音韵系统和语法结构的改变。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的词汇史的建立。”(第417页)从传统的音韵学发展为汉语语音史,训诂学转变为词汇史,这是把古代的“小学”变成现代语言学,是一场学术研究的革命性转变,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到研究方法都有明显的不同。研究目的从“解经”和注释文献变为“探索词汇发展规律”;研究对象从生僻词转为常用词;研究材料从历史上的文言转向现实的白话(包括书面语和更加广泛的口头语);研究方法则从文献考证转向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永言先生倡导的常用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且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成果,应该说,他的这一倡导功不可没。

1991年,永言先生发表了《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用常用词的历史演变的事实,论证了《列子》确实是出自晋人之手的伪书。如《黄帝》“吾诚之无二心,故不远而来”,将“诚”用作“相信”的意思,与《尔雅》的“诚,信也”并不相符(第365页);又如《说符》“为人有善数者,临死以诀喻其子”,他引了许多书例证明“‘诀’是晋代的新词新义,在东晋典籍中尤为常见”(第367页)。这个“诀”,现今闽南话还用作单音词表示“诀窍”。这是用词汇史来辨别古籍真实年代的好办法。可见,常用词的历史研究不但是研究词汇史的根本,还有其他方面的功用。

从以上所述《语文学论集》的创获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永言先生在训诂学向词汇史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杰出贡献,说他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开拓者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除了《语文学论集》,永言先生还有出版于1982年的《词汇学简论》,严学宥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它“对词汇学各关键问题都有所论列,取材广泛,叙述精要,观点新颖,适合作为普通词汇学的入门向导,对汉语词汇的研究,也富有指导意义”(张永言1982,“弁言”)。如果说《词汇学简

论》是本简明扼要的入门指导,《语文学论集》则可以给从事训诂学和词汇史研究的学者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两书出版以来一直是引用率很高的名著。永言先生亲手题签送给我的这两本书,一直在鼓励、引导着我学习词汇学、研究词汇史。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道拿它作为指路明灯。

张先生从教已经六十五年了,他精心培育的弟子一个个都很杰出,已经成为词汇学领域里的中流砥柱。每次在他那狭小的阁楼里见到他时,他总是念叨着学生们待他怎么好,平时常有电话问安、报道研究成果,过生日还远道而来,聚集于成都。平淡的交谈中使我见到了他那清澈明亮的心灵。最近,他的门生们要为他出版从教六十五周年的纪念文集,嘱我写篇文章,我是张先生的不合格的学生,却之不恭,就写下了以上的所感。谨以此表示我对张先生的敬重。张先生待人,一向是宽厚的仁者,为学则一直是勇敢的智者。仁者寿,智者寿,张先生应该有双重的大寿。

参考文献

张永言 1982:《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张永言 1999:《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

王力 1985:《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威廉·冯·洪堡特 1997:《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 1997:《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2009:《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

小议词义的扩大和缩小

蒋绍愚

汉语史上词义的扩大、缩小,以往的学者对做过不少讨论。孙景涛(2010)汇集了七部专书中提到的词义扩大三十七例,词义缩小二十六例。抄录如下。

词义扩大:

江,河,匠,皮,嘴,雌,雄,基,棘,响,绪,帀,库,布,精,粗,房,屋,虫,货,母,门,除,洗,闭,唱,涉,卧,访,睡,转,细,强,九,脸,苦,去。

词义缩小:

子,肥,寡,吃,宫,恶,生,舅,姑,禽,瓦,弟,金,谷,情,女(妇女→未婚少女),男,女(女性→女儿),鼓,售,朕,辇,上,妃,诏,臭。

这些词究竟是不是词义的扩大和缩小?恐怕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究竟什么是词义的扩大和缩小,用什么做标准来判断词义的扩大和缩小,还是需要讨论的。我认为,词义的扩大和缩小,首先要和词的义位的增加或减少区分开来;其次,词义的扩大和缩小必须是下位义和上位义之间的变化。不过,本文不拟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打算对上述例子一一加以考辨。本文的意图是就几个典型的例子,对扩大、缩小产生的途径和原因作一些讨论。

关于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有一段论述:

词的意义变化有时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类型:缩小、扩大、转移。意义由一般变特殊就是缩小;反之,意义由特殊变一般就是扩大。两个意义如果在范围上彼此相等或虽有差别而无关紧要,它们由于接近而从一个意义变成另一个意义,这就是转移。不消说,扩大或

缩小往往是由转移而引起的。(房德里耶斯《语言》中译本,第224页)

词义演变分为“扩大”“缩小”“转移”三类,这是我们熟悉的说法。这三类的区分,主要是词的旧义和新义的范围大小不同。从旧义演变为新义,如果是从下位义演变为上位义,就是扩大;从上位义演变为下位义,就是缩小;除此以外,都是转移。也就是说,是着眼于词义演变的结果的。那么,从词义演变的途径来看,“扩大”“缩小”和“转移”是否相同呢?

转移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引申的心理基础是联想。那么,扩大和缩小是否也是引申的结果?其心理基础是否也是联想?房德里耶斯上述引文中说:“扩大或缩小往往是由转移而引起的。”研究汉语的学者很多采用房德里耶斯关于“扩大、缩小、转移”的说法,但很少引用他这一句话。确实,如果按照他这句话,“扩大、缩小、转移”这三个类型的区分就不存在了;或许,他在这句话里说的“转移”,和他所说的“扩大、缩小、转移”这三个类型的“转移”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这一句话,就认为扩大、缩小也是引申的结果,或者说,扩大、缩小的心理基础也是联想。

那么,扩大、缩小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的?一般认为,词义的扩大和缩小都是基于“个别——一般”和“一般——个别”的联想。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人们用这个概念范畴里突显度最高的个体来代表这个概念范畴,是常有的事。比如,以“老虎”代表猛兽,以“诸葛亮”代表智者。反过来,提到“猛兽”,就容易想到“老虎”,提到“智者”,就会想到诸葛亮。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很多概念范畴里都会有突显度最高的个体,但表达这种个体的词并没有全都发生词义扩大的演变,比如“虎”的词义并没有扩大为“猛兽”,“泰”或“华”的词义也没有扩大为“山”。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仅仅以此来解释词义的扩大和缩小的原因是不充分的。下面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讨论。

一、扩 大

1. 河

“河”本指黄河,后来指所有较大的河流(特别是北方的河流)。这变

化大概从秦汉开始。《史记·项羽本纪》：“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正义》曰：漳水。救巨鹿。”从巨鹿之战的地理位置看，项羽渡河渡的是漳河，张守节《正义》的注解是可信的。这是“河”表示一般大河的较早的例子。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种常见解释是：河（黄河）的上位概念是河流（先秦称“水”或“川”）。在“河流”这个概念范畴里，“河”（黄河）是一个突显度最高的个体（就北方的河流而言）。所以，“河”的词义会扩大为一般河流。但上面说过，仅仅这样解释是不够的。对“河”的词义扩大，还要作细致的考察，找出其具体的触发原因。

先秦汉语中，作为上位词的“川”和作为下位词的“河”都可以和“山”并列，形成一个固定组合，但两者意义不同。“山川”指一般山脉河流，“山河”指险要的地形。两者的构成也有不同，“山川”的“山”和“川”都是类名，“山河”的“山”是类名，“河”是专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是说晋国的地势。这里的“山”是类名，具体可能指华山，“河”是专名，指黄河。

但是，有时候要表达地形的险要，可能不仅仅提到黄河，还会提到别的河流。请看下面《战国策》的一段文字：

《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谿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鲍注：“按：天门，即《史》太华、伊阙……天谿即河、济。”